

我国课程论重建的先驱者和奠基人

——纪念陈侠先生诞辰100周年

吕 达，刘立德

(人民教育出版社，北京 100081)

摘要：陈侠先生对我国课程论重建的先驱性奠基性贡献可概括为五个“第一”：撰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课程论》专著；主编了新中国第一部《教育大辞典》的课程和各科教学分卷；改革开放后在高校开讲课程论的第一人；参与创办并长期执编我国第一本课程专业期刊《课程·教材·教法》；主编了新中国第一套《课程研究丛书》。

关键词：陈侠；课程论；重建；贡献

中图分类号：G4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0186(2015)03-0033-07

陈侠先生（1915—1992），曾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审，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我国现代著名的课程学家、教育学家和编辑出版家。这位课程论一代宗师，不仅在人教社主持编辑出版了大批有重要影响的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并执编教育期刊，而且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教育科学研究，撰写了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和著作。陈先生不愧是研究型、专家型编辑的典范。叶圣陶先生称他为“认真研究教育的有心人”。

陈侠，1915年2月6日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33年毕业于江苏省立扬州中学高中师范科，同年先后任江苏省立南通中学附属实验小学教员、江苏省立界首乡村师范学校教员兼附属小学主任（相当于校长）、江苏省立扬州实验小学低

级部主任、江苏省立大港乡村教育实验区《乡村教育》杂志编辑。同时，参加初等教育研究社，参与编撰《初等教育研究集》。陈侠从做小学教师开始，一直坚持写心得，坚持教学与科研互动，这对他最终成为成就卓著的教育学家所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陈侠入内迁到西北的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后更名为西北师范学院）教育学系学习；1942年毕业，留校任西北师范学院教育研究所助教，并师从著名教育家李建勋读研究生。1947年起晋升讲师。翌年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曾兼任该校附小校长，历任该校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及甘肃《地方教育辅导丛刊》编辑等职。

新中国成立后，陈侠于1950年调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任编辑。同年12月1日人教社成立后转本社工作，历任教育编辑室（原名

收稿日期：2014-12-08

作者简介：吕达，1944年生，山东栖霞人，中央直接联系的专家，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咨询委员，曾任副总编辑、常务副所长，兼任教授、博导，上海、澳门课改顾问等职，主要从事课程教材与教学研究；刘立德，1965年生，河南永城人，人民教育出版社文化教育室主任、编审，主要从事教育史和教师教育研究。

编审部教育组)编辑、副主任、主任、编审,《教育译报》副主编。“文革”期间,人教社被解散,全体人员“下放”到安徽凤阳。“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鼓舞下,陈侠虽已年过花甲,却以高昂的热情投入编辑出版和教育科研工作。1979年,他参与发起全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前身),任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80年4月,参与创立人教社课程教材研究室(课程教材研究所的前身),任研究员。同年6月19日,人教社成立《课程·教材·教法》杂志编委会,戴伯韬任主任,叶立群、陈侠等任副主任,由陈侠主持日常工作。1981年,《课程·教材·教法》正式创刊,陈侠任副主编,并主持日常工作(当时没有单独编辑部)。1983年6月10日,教育部党组批准成立课程教材研究所,7月20日邓小平题写所名。这是第一家国家级面向基础教育的课程教材研究机构,陈侠任学术委员会常务委员。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后,课程教材研究室改建为课程研究室,以研究课程理论为主,由陈侠负责;教材研究任务则由各学科编辑室承担。鉴于陈侠在教育学术上的造诣,他还被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学分支学科副主编,西北师大等7所高校兼职教授,《教育大辞典》编纂委员会委员兼《课程和各科教学》分卷主编,并当选民盟人教支部负责人、民盟北京市委委员兼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6年虽办理退休手续,但他退而不休,仍一如既往地积极主动承担许多编辑出版工作和研究任务,直至病逝。

陈侠毕生在教育战线辛勤耕耘,几十年如一日,一方面投身教育教学的实际工作,并从事师范教材和教育书刊编辑出版工作,另一方面执著地潜心于教育科学研究。他著述颇丰,主要有《建国的儿童训练法》(1941年版)、《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1944年版)、《国民学校教学实际问题》(1946年版)、《国民学校教学之改进》(1948年版)、《论教育规律及其他》(1983年版)、《师范教育和教育科学》(1985年版)等。他还有大量教育译著行世,并主持选编了《李建勋教育论著选》和《傅葆琛教育论著选》等。而最为著称于世、影响深远的传世之作无疑

是《课程论》(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二

在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课程论这门学科也曾昙花一现,既有翻译引进的外国课程论著,也有包括陈侠在内的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课程史和课程论著述。新中国成立后,主要由于政治原因,我国的教育学和苏联的教育学一样,从宏观结构看,没有关于课程的专门篇章,只有“教学内容”的章节。

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后,就课程教材改革而言,单有国家课程和一套教材已远不能适应各地各校要求,地方课程、校本课程研发呼之欲出,“一纲多本”教材也势在必行。关注学校课程的人越来越多,课程教材研发人员,教育领导和管理干部,尤其是广大教师,都需要课程理论知识。不懂得课程,就不可能自觉地、准确地执行课程计划(教学计划)和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更不可能主动地、创造性地开发课程,也不可能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选择和使用适合自身情况的教材,以提高教学质量。

陈侠正是较早地认识到社会的转型,从而较早地把视线聚焦到学校的核心问题——课程。当教育结构(即各级各类教育的比例及相互关系)问题基本解决后,教育改革必须也必然深化到学校课程领域。课程是学校培养未来人才的蓝图,是学生通往社会的桥梁。在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关系上,显然,以往以教学(论)等或代替或涵盖课程(论)的理论已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行不通。课程、教材、教学三者既密切相关,又不能完全等同。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教育开始了重要转折:1985年,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教会召开,《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1986年,我国决定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在此背景下,1986年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成立。这标志着我国中小学教材由编审合一走向编审分开,由国定制走向审定制,由一纲一本走向一纲多本,即在国家统一的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化。这是我国中小学教材“制度”的重大变革(此前我国中小学教材也曾有过多样化,而且人教版教材也有过多样化,既有面向大部分地区的

教材，也有各具特色、异彩纷呈的实验教材，但国家教材基本制度尚未改变）。教材制度的变革，既与课程教学改革密切相关，又直接影响课程教学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以下几个事件，均早于1986年。其一，1983年，我国首家课程教材研究所成立。而在此前的1980年，人教社即已设立了课程教材研究室，由陈侠具体负责。其二，1980年，人教社开始筹备《课程·教材·教法》，陈侠是主要负责人之一。该刊创刊伊始，就发表了叶圣陶、戴伯韬、叶立群和陈侠等老一辈教育家有关课程改革的一系列论文。这些先驱者们以该刊为阵地，最早吹响了我国新时期课程改革的号角。其三，陈侠从1984年起为多所高校研究生系统讲授课程论。后来，课程论这门学科正式进入我国高校课程教学计划之中，乃至许多高校陆续设置课程学系或课程与教学系，课程与教学论成为越来越多硕士生、博士生攻读的学科和研究方向，应当说，陈侠开讲课程论具有开先河的意义。

毫无疑问，上述三个事件并非孤立，亦绝非偶然。最根本原因是社会发展和时代变革为我国新时期课程论的重建提出了急迫要求，呼唤课程论在教育学体系中占有应有地位。同时，各地中小学课程改革丰富的实践探索，为课程论的重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鲜活营养。当时先后任人教社主要领导的戴伯韬、叶立群等高瞻远瞩，洞察时局，甘当伯乐，知人善任，把编写我国第一本课程论的重担交给了陈侠。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有这样的眼光和胸怀，从事业出发，尊重知识和人才，与党外高级知识分子肝胆相照，推心置腹，是非常值得称道和发扬光大的。陈侠不负重托，除了不折不扣做好一系列师范教材和教育书刊编审工作，全心全意履行全国教育学会秘书长职责外，经过9年的不懈努力和辛勤耕耘，出色地完成了《课程论》撰著任务。

陈侠《课程论》1989年3月由人教社出版，而该书的主要学术成果在此前几年中已陆续发表于专业期刊或高校讲坛。这部《课程论》既是新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的课程论学术专著，又是新中国第一部课程论学科的大学通用教材。它的特点主要有：其一，作者明确把“中国特色”作为

目标，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论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结构体系和话语体系，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这是该书最鲜明的特点。这也是作者致力于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体系的重要尝试。其二，该书不是空谈理论，也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是有的放矢，把学校课程编订与教育目标挂钩，分别阐述学校课程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和实施全面发展的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教育目标和课程的性质、任务、类型、编订、实施和评价的关系。其三，该书内容丰富全面，深入论述了课程论各方面的问题，包括课程研究的对象、目的和方法，中国和外国学校课程的演变，国外课程理论流派，制约学校课程的各种因素，学校课程的编订和实施，学校课程的评价，学校课程编订的发展趋势等。其四，特别具有重要价值的是，该书全面总结了我国几十年来学校课程编订和实施方面的经验教训，并使这些可贵经验理论化、系统化，这对我国今后课程改革无疑具有重大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意义。该书把我国几十年来在课程编订和实施中遇到并争论过的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总结概括为应如何正确处理的十大关系：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现实需要的关系；传授知识与发展智能的关系；文与道的关系；巩固“双基”与吸收新知的关系；统一要求与适应差异的关系；文科与理科的关系；逻辑系统与心理系统的关系；直线前进与螺旋上升的关系；课内与课外的关系。

综上所述，该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学校课程进行了研究，突出了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对课程理论和实践的影响，初步确立和奠定了中国课程论学科体系、框架和范式，成为当时和后来课程论的学术研究、教材编写和教学改革的领跑者。该书反映了当时历史条件下我国课程论教学和研究水平，它对新中国课程论的重建和发展立下的筚路蓝缕的开拓奠基之功是彪炳史册的。同期和此后我国又有一些课程论专著应运而生。课程论研究在我国教育学界渐成热点，甚至一度发展为“显学”。在我国，课程论作为教育科学分支学科的地位终于得以重建，形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随后又催生了全国性的课程研究学术组织——课程专业委员会（后改名课程学术委员会，隶属于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

会)。饮水思源,我们应当铭记陈侠先生对课程论研究的开拓引领之功。

《课程论》是陈侠学术研究的最高成就和主要代表作之一,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最宝贵的学术遗产。该书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甫一出版两年内即连续两次获得殊荣:出版当年即荣获全国首届优秀教育理论著作奖,1991年荣获《光明日报》光明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二等奖。该书至今仍被一些高校列为教育学科博士、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参考书和教学必读书。

在撰著《课程论》的同时,陈侠还主编了《课程研究丛书》及《教育大辞典·课程和各科教学》。这些工作在当时对我国课程论重建的奠基也起到了添砖加瓦的作用。陈侠主编的《课程研究丛书》从1985年开始由人教社陆续出版,选题中既有翻译引进的发达国家的课程专著,又有我国学者自己的课程专著。译著主要包括:英国丹尼斯·劳顿等人的《课程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美国比彻姆的《课程理论》,日本伊藤信隆的《学校理科课程论》,苏联克拉耶夫斯基等人的《普通中等教育内容的理论基础》。《教育大辞典·课程和各科教学》的编纂工作,正好同人教社各科教材编辑和研究工作密切相关,陈侠组织各编辑室人员参与其事,实际上成为人教社一项重要的科研活动,既出了成果,又锻炼了队伍。

还应当指出,我国课程论重建的奠基工作与《课程·教材·教法》杂志的编辑出版工作也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陈侠一方面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课程论文章,以自己的研究成果与广大读者作者交流,以文会友;另一方面广泛联系、吸引、凝聚作者读者的力量,营造课程改革势在必行的社会舆论,为课程改革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该杂志定位明确、特色鲜明,越办越大,越做越强,被誉为“教师的挚友,教研的助手,教改的参谋”,多次荣获国家级大奖。

概而言之,陈侠对我国课程论重建的先驱性、奠基性贡献,可以归纳为五个“第一”。一是撰著了我国第一部课程论专著,发表了一批有分量的课程论学术论文,既提出了课程论的总体架构、学科体系,又探索了课程论的重点问题、发展方向。二是在新中国第一部《教育大辞典》中主编了《课程和各科教学》分卷,第一次界定

或规范了课程和各科教学的有关内容。三是担任河北大学、辽宁师大、哈尔滨师大、西北师大、华南师大、广西师大、杭州大学等高校兼职教授,是在全国高校系统讲授“课程论”这门课程的第一人,课程论在教育科学中的学科地位开始确立。四是主持执编国内第一本课程专业学术期刊《课程·教材·教法》,为课程论的重建提供了理论基础和舆论准备。五是主编新中国第一套课程学术丛书《课程研究丛书》,为中国特色课程理论体系的创建和完善提供了学术支撑。

三

课程论的重建不是孤立的,没有相关领域的丰富知识、学养、经验和成就,课程论的重建就只能像空中楼阁。陈侠之所以能在课程论重建上卓有建树和突破,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是,他在相关领域都进行了持之以恒的研究,具有广博深厚的学识根基,开阔的学术视野,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而为课程论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石。

(一) 课程史——昨天、今天与明天:让历史照亮现实、告诉未来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没有昨天和前天,就不会有今天。昨日之史,是今日之论必不可少的借镜。不了解历史,既可能把老祖宗早已知悉的道理、行之有效的举措,当作自己的新发现、新发明来炫耀,也可能重蹈覆辙,穿新鞋走老路,或者走弯路甚至走错路,而茫然不知。

陈侠早在1944年就撰著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小学课程史专著《近代中国小学课程演变史》。这部专著共六章,对近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宗旨及目标、课程演变及特色、课程实施及成效进行了认真总结、概括和分析,并进行了点评。该书出版60多年后,由李臣之重校,入选由瞿葆奎领衔主编的《20世纪中国教育名著丛编》(2007年版)。这套丛书《出版说明》指出:“辑入这套《丛编》的,皆历经了50年以上时间检验的、水平较高、影响较大、领学科风骚的著作。”应该说,陈侠这本课程史著作,为他40多年后的课程论研究铺垫了道路。无独有偶,也是四十多年后,作为陈先生团队的后学者,笔者(吕)的博士论文选择了中学课程为切入口。一

个小学，一个中学，看似巧合，实属必然。

史论结合，据史立论，论从史出。昨天是今天和明天的必由之路。让历史照亮现实、告诉未来，这就是课程史对课程论必不可少的作用。

（二）教学论——与课程论相辅相成：谁也离不开谁

课程（论）与教学（论）的相互关系有四种说法：一是二元论；二是同心圆论；三是交叉论；四是互动论。无论哪种说法，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课程（论）与教学（论），谁也离不开谁，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辅相成。显然，研究课程论，必须也必然关注教学论，这是题中应有之义。陈侠虽以课程论专家著称，但他的目光须臾未离开过教学论。这里仅举他对几个重要概念的辨正。

20世纪50年代初，无论是凯洛夫《教育学》最初的中译本，还是我国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把俄语中三个相关的词译为“教育”“教养”“教学”。由于含义不清，难以正确界定和区分，给教育理论研究和教育实际工作，特别是给师范院校师生带来许多麻烦。经研究，陈侠认为三个词含义相近，都可统译为广义的“教育”；我们的教育学不必把“教养”这个概念同“教育”和“教学”混在一起，通常只要提“教育”和“教学”两个概念就行了。陈侠在《人民教育》1953年第3期发表论文，对这个问题专门作了辨析。在一次讨论师范学校教育学教学大纲的会议上，陈侠提出了上述建议，得到在场的教育部党组书记、副部长钱俊瑞的肯定，并在会上确定下来。此后，我国教育界不必再为弄清“教育”“教养”“教学”这三个含义不清的概念而困扰和浪费时间了。

“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的一个根本观点，也是我国教育方针的基本内容。但在20世纪50年代初，人们对全面发展含义的理解却是混乱的。凯洛夫《教育学》1948年版中译本（1951—1952年出版）把“全面发展”译成“个性的全面发展”。陈侠认为这样翻译不准确，违反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原意，给我国教育界造成了许多混乱。他查阅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教育学著作和辞典等，经过分析研究，写成《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全面发

展》一文（载《人民教育》1956年第12期），指出：全面发展是指“人”的全面发展，而不是“个性”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就是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个性”的全面发展，则是个人兴趣、爱好、性格、气质、特长的发展，而这样就很难说是全面发展了，尽管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了发展个性中的积极因素，但不能仅限于这些方面。在当时，由于译文不确切，许多人写文章讨论“‘个性’的全面发展”时争论不休，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师范院校师生在教育学、心理学教学中也遇到同样难题。陈侠经过考辨，厘清了“全面发展”这个术语的正确译法，随后，1957年，陈侠牵头翻译了1956年版凯洛夫《教育学》。

（三）心系师范教育——紧紧围绕整个教育的工作“母机”

陈侠早年毕业于高中师范科，后在师范大学接受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又当过小学教师和校长，还长期从事师范教材编辑出版工作。他毕生与师范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对师范教育一往情深。

基础教育课程与师范教育密不可分。陈侠认为，研究课程论（这里主要是指基础教育阶段），毫无疑问，必须也必然同师范教育同呼吸共命运。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一生为师范教育大声疾呼，鸣锣开道。其执编《课程·教材·教法》一直坚持设置“师范教育”专栏就是一个例证。这同早期人教社“一体两翼”方针（以中小学教材为主体，以师范教材和教育图书为两翼）也是完全吻合的。

陈侠曾担任人教社教育编辑室主任多年，期间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师范教材研究开发工作。1952年秋，教育部向人教社提出了编写中师《教育学》和《心理学》教材的要求。陈侠作为教育编辑室负责人，既是这两部教材编写的组织者之一，又是《教育学》的主要编写者之一。这两部教材在我国曾长期使用。

1985年7月，陈侠根据刚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不失时机地策划了《师范教育丛书》。该丛书定位是：为在职中小学教师、师范院校教师及教育行政干部提供比较系统的教育学科进修用书，并为各级师范学校学生提供教育学科课外读物。这套丛书共十卷

十一册,计有:《教育概论》、《中国教育史纲》(两册)、《外国教育史略》、《教育心理学》、《教学理论和方法》、《学校德育》、《学校体育》、《学校管理》、《中小学的劳动技术教育》、《人民教师的道德修养》。该丛书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套师范教育丛书,对十年动乱后师范院校广大师生来说,无异于雪中送炭。

(四) 洋为中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一门学科的建立(或重建)和发展,既要继承发扬本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又要借鉴吸取国外先进的学术成果和智慧营养。没有继承就难以发展,没有借鉴就难以创新。

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侠担任人教社教育编辑室主任,当时恰逢学习苏联的高潮时期。他主持或参与主持翻译出版了一系列苏联师范教材和教育理论图书。

凯洛夫总主编的俄文版《教育学》有1939年、1948年和1956年三个版本。因为该书由当时俄罗斯共和国教育部长凯洛夫任总主编,所以我国学者俗称“凯洛夫教育学”。1950年12月,人教社翻译出版了该书1948年版上册,翌年10月,翻译出版了1948年版的下册。1951年3月和1951年12月人教社出版了该书上下册的第一次修订版,1951年12月和1952年12月人教社又出版了该书上下册的第二次修订版。第一次修订版改正了译文的个别词句,第二次修订版对译文作了若干原则性的修订。全国各地的师范院校、各类教师进修学校、教育部门、干部培训部门统一把凯洛夫的《教育学》作为指定教材。《人民教育》杂志1953年第3期发表了陈侠的专文《凯洛夫〈教育学〉中译本第二次修订述要》。

1956年底、1957年初,凯洛夫访华。人教社社长叶圣陶专门会见了凯洛夫。在华期间,凯洛夫向中方透露了俄文新版(1956年版)《教育学》刚刚修订完毕的信息。1956年版出版后,苏联专家于10月将该书寄到北京,陈侠等紧锣密鼓地组织翻译。1957年即出版了该书1956年版中译本(凯洛夫总主编,冈查洛夫、叶希波夫、赞科夫主编,陈侠、朱智贤、邵鹤亭、于卓、李沂、熊承涤、郭如琴、张渭城、李子卓、陈友松译)。该书分总论、教学论、教育理论、学校行政和领导,共四大块。我国后来相当长时

期编写的大部分《教育学》教材都没有超出这个四大块的体系。

凯洛夫《教育学》在中国流行达数十年之久。它对中国教育理论的影响有正负两面。正如瞿葆奎在《中国教育百年》中所说:“从教育学建设的角度看,原苏联的教育学帮助国人完成了教育学理论模式的格式塔转化,填补了当年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空白。当然原苏联的教育学本身有许多不足,如操作性较强,理论性较差;教条性较强,辩论性较差;等等。”应当说,这一评价是切中肯綮的。

据统计,至1957年11月,我国翻译出版苏联教育书籍共360多种,仅人教社一家翻译出版的苏联教育书籍就达303种之多。所有这些工作,陈侠都不同程度地担当了重要角色,为马列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陈侠虽然重点工作已经转到课程论研究,但对外国教育仍一如既往地关注和投入。这与课程论研究工作非但不矛盾、不冲突,相反更开阔了视野,提供了借镜,活跃了思想。改革开放后,人们急需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教育的现状,改革的经验教训,发展的动态趋势,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提供参考,急需找到十年动乱后我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陈侠领衔组织翻译外国教育和比较教育论文和资料,选编出版了改革开放后第一套《外国教育丛书》。这套丛书共出了34本,陈侠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和心血。

这套丛书涉及的内容是全方位、多角度的,按专题分门别类,切合了我国实际需要,极具针对性,因此广受欢迎,并荣获表彰。新华社说,这是最早反映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窗口之一。应该说,这种高度评价是恰如其分的。这套丛书在当时外国教育研究领域是独树一帜的。与此同时,如前所述,陈侠主编的《课程研究丛书》重视收录外国课程著作,他执编的《课程·教材·教法》还开辟了研究资料专栏(后改名“研究与借鉴”)。由此滥觞,人教社陆续推出了《外国教育名著丛书》等,均享有盛誉。

总之,陈侠在课程史、教学论、师范教育、外国教育(比较教育)等领域的辛勤耕耘及其成就,相互关联、相互交融,成为他致力于重建我

国课程论奠基工程中的重要基石。

四

如果说课程论重建是陈侠毕生最重要的贡献,那么,参与发起全国教育学会和热心传播教育科学理论,犹如两个轮子,助推着陈侠重建课程论的先驱性、奠基性工作。1978年10月,人教社在开封主办全国教育学教材研讨会,陈侠参与主持会议,并作了学术报告。期间,陈侠起草《筹备组织教育学会倡议书》,与会代表共同倡议成立全国教育学会。教育学会筹备组设在人教社,陈侠是核心成员,参与起草章程等工作。1979年3月23日至4月13日,陈侠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在会议结束时的4月13日,全国教育学会召开成立大会。戴伯韬当选为理事长,陈元晖等当选为副理事长,陈侠为秘书长。陈侠担任秘书长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同人教社密切互动,编辑出版了《论教育的本质和职能》等“教育学术论文集”12卷,为教育理论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立下汗马功劳。

众所周知,学会的生命在于活动。如上所述,作为全国教育学会首任秘书长,以及民盟中央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陈侠有机会几乎足迹遍及全国各地,接触了各级各类的学校和师生。

所到之处,他对当地教育状况必作深入实际的考察,取得大量丰富的第一手资料。生活之树常青,充满活力的教育实践活动,正是教育科学理论研究获得累累硕果的不竭源泉。同时,这些亲临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活动,也为陈侠将教育科学理论通俗化、大众化、普及化提供了广阔天地。

陈侠先生留给我们的除了他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他的道德、作风和精神;这些好像看不到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发挥着作用,这种无形的力量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地影响我们,指引我们如何做人,如何治学。陈侠先生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和出版事业。“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今天,我们纪念陈侠先生诞辰100周年,就是要铭记、缅怀他的杰出贡献,不断学习研究、继承发扬他的学术思想和优良作风,继往开来,改革创新,为进一步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而不懈奋斗!

(附言:本文参考了肖云瑞等先生的有关文章,并征求了陈侠先生长期工作过的人教社的领导和有关部门同仁,以及陈侠先生亲属的意见,特此鸣谢!)

(责任编辑:刘启迪)

The Pioneer and Founder of the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in China
——Commemoration of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Chen Xia
Lv Da, Liu Lide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pioneering and fundamental contributions of Chen Xia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of Curriculu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be concluded as five “number ones”: he wrote and published the monograph *Theory of Curriculum*, the first on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coordinated the compilation of the part on Curriculum and Subject Teaching in the first *Dictionary of Educa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was the first scholar who lectured in curriculum in a number of universitie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he contributed to the start of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academic journal on curriculum entitled *Curriculum, Teaching Material and Method*, and took charge of its editorial work for a long time; he compiled the first set of *Series on Curriculum Research*.

Key words: Chen Xia; theory of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contributions